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栾 嘉¹,董运庭²

(1. 第三军医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38;2. 重庆师范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47)

摘 要: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帝王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08)03-0098-05

历代论《史记》者,或以为“谤书”,或以为“实录”。不难了解,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封建社会,为帝王作纪,实则“谤书”与“实录”是可以划等号的。《史记》成书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以“狭私成史”受到广泛批评。两千多年里,《史记》的命运戏剧般跌宕起伏,或封禁秘藏、或削减删改,受到的评价亦是毁誉、水火相争^[1]。那么,《史记》中究竟记录了汉初统治者的哪些行为?太史公究竟说了什么不该说、不能说的话?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纪高祖,揭统治者背信弃义、残忍不仁之面目

《史记·帝王本纪》中叙其当代史篇目一共5篇,分别是《高祖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

和历史事件既不会作全盘的褒扬和肯定,也不会作全盘的贬斥和否定。如纪汉高祖刘邦,紧扣了两条主线:一是以秦始皇的暴戾不仁为参照系,点明了汉得天下的必然性;二是通过具体事例对刘邦的道德品质提出质疑,生动地勾勒出一个流氓加帝王的形象。这种一笔兼顾两面便构成了司马迁纪录帝王行为的义例^[2]。

《高祖本纪》重在写刘邦的成功,表现刘邦人品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并通过“互见”方式在其他篇目也有表现。《高祖本纪》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公元前204年,楚汉对峙,刘邦被困荥阳,粮草断绝,为突围脱逃,他将2000多名女子乔装成士兵放出东门引楚军追赶围打,自己趁机脱逃。这段记录在《项羽本纪》中也有,只是文字稍有变动。这两段内容揭了刘邦的“老底”,身在军中,又是一代将领,战败后为求脱逃,竟然将手无寸铁的女子

* 收稿日期:2008-01-01

作者简介:栾 嘉(1980-),女,重庆市人,助理编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史记》及司马迁生平研究。

当肉盾。手段之下作绝非英雄之举。

著书者应避免前后文字与内容的重复。司马迁这样的大家,其对史料的取舍、文字的驾驭能力毋庸置疑,而他在两篇纪中一再地重复这个片段,除加深读者的印象外,意在暴露刘邦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垓下之战”后,刘邦曾以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项羽人头,手下骑兵为争抢项羽尸体,不惜互相践踏,竟将项羽躯干一分为五,所持者均分得项羽的土地。刘邦为降服坚强不屈的鲁县军民,又拿项羽人头示鲁县作为威胁,手段残忍有悖人伦。鲁县归降后,刘邦按照楚王分封项羽鲁公这一封号的礼仪安葬项羽于穀城,并亲自发丧。大丈夫敌则敌、友则友,理当分明。而刘邦的前后种种行为相对比,完全是一场虚情假意的作秀,其人格品德便呼之欲出了。

读《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看得出司马迁将汉高祖刘邦与韩信亦作了一番比较,写到二人年轻时的奇遇:刘邦年轻时曾遇一老者预言其面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父老处”。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斤……”一个是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一个是知恩图报、情深意重。仅此一笔,意在不言中,却体现了作者的褒贬倾向。

说到刘邦的背信弃义,体现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列了高祖元年(前206)至武帝太初四年(前101)105年间诸侯王国的发展变化情况,其序曰:“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刘邦在与项羽作战的时候本来也不打算分封诸将为王侯,但诸将在当时都极热衷于这一项,刘邦为换取各路将领共同消灭项羽,只好分封了异姓诸侯王共7人,但在灭掉项羽后,刘邦很快找各种借口和罪名将他们逐个消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谱列了帮助刘邦打天下的143人由被封侯到其侯国很快在几年或几十年内被取消。以刘邦为首,汉代建国以来历朝皇帝对付功臣诸王、诸列侯的事实,我们可以从韩信、彭越、黥布、周亚夫等人的传记中读到。

二、纪吕后,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

昔人以项羽、吕后不当入本纪,而后多数人认

可“刘邦尚未击败项羽时,天下唯项羽是瞻;吕后掌握至高皇权、执行政事主宰15年。故司马迁将项羽、吕后看作是短暂得过天命”。张振~先生又指出“项羽入纪实为完善《史记》体例”的观点^[3],从而我们可以推论出吕后入纪也是完善了《史记》体例,以完备吕后执政八年中大纪事之总纲。

李景星曰《吕后本纪》“不书妖祥水旱及其它诸大事,纪以王吕危刘为主,不欲以他事相杂也”^{[4][14]}。道出太史公书本篇之目的,旨在披露汉初最高集权内部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血淋淋的真实内幕。

吕后这个人自然而然成为了统治阶级党羽与党羽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吕后与后宫其他妃嫔的对立,始于“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吕后与汉高祖本人的对立,始于“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随即,吕后党与戚派党交锋于“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吕后与宗室的对立,始自残杀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吕后与群臣的对立始发就是杀韩信,杀了汉朝开国的大功臣;而杀韩信同时也是树立其威望的最有名的一举,把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上,令群臣慑服。

刘邦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对此,后人多一味地视其“非人所为”,唾骂吕后的残忍和狠毒,而忽略了戚夫人被残杀的根本原因——她对吕后母子的作为必定也非善举。这或可解释吕后在刘邦死后放过薄姬、管姬等情敌,却独独不肯放过戚姬,稍加分析不难得戚姬只不过是争夺权力的集团之间相互厮杀而最终失败的那一方。

前面提到刘邦搞分封制,又“非刘氏者不得王”。刘邦死后,吕后执政,为了自己的揽权、专权、固权而大肆培植吕氏势力,广封吕氏宗族为王。为此,吕后大开杀戒,残酷打击刘氏宗室和刘邦的元老功臣,诛灭刘邦诸子。吕后一死,刘氏宗室与刘邦元老功臣联合,一举诛灭吕氏党羽,吕氏诸王牵连惠帝诸子所面对的必然又是一番血腥杀戮。司马迁将吕后欲王吕氏而“风大臣”的欲盖弥彰、“取美人子名之”的弄巧成拙、废帝更立时的装腔作势,都描绘得活灵活现。一边流露出作者对玩弄权术的上层政治女性的憎恶,同时也展现了

汉代宫廷内部人伦丧失、人与人之间毫无人情、诚信可言,只有相互利用和明争暗斗。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

《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廩廩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5]1148}。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4]115}。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肉体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激情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

马迁 37 岁至 38 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再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6]。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超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

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抄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抄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5]1131}

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

《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1]。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槃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准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

书》),司马迁明确地道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发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

清代学者赵翼说: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於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7]。

这段话对于《史记》历尽了历史的重重考验,最终被奉为信史作了充分的肯定。顾颉刚说:“自古迄今,没有一部史书能够与《史记》‘抗颜而行’。”其书虽事多而理论少,但它隐显交错,在史事采摭上,议论发皇上,褒贬崇替上,皆相互发明,能以贯达全书。《史记》实在是以史明义的书,‘一家言’的实质,即在于此。^[8]司马迁对封建统治者种种丑恶的大胆揭露与批判令后世史家仰望而莫及,也由此奠定了《史记》在中国历代史书中不可逾越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董运庭.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5(3):265-271.
- [2] 张强.论司马迁仁学思想的来源与帝王批判[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80-86.
- [3] 刘知几.《史通笺注》[M].张振,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 [4] 李景星.《四史评议》[M].韩兆琦,俞樟华,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14.
- [5]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下转第 116 页)

- [9] 刘镇江. 江泽民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0] 刘克利,罗仲尤. 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属性[N]. 光明日报, 2007-12-24.
- [11] 余谋昌. 生态伦理学[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31.
- [12] 尹世杰. 消费环境与和谐消费[J]. 消费经济,2006(10).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Consumption Ethics and 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U Da-hai, LI Chun-hua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The 17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has put forward that the social harmony is the essence attribut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written into the report of the Party Congress firstly. The social harmony contains the consumption harmony, and the consumption harmony is a concept of science, humanity, coordination and health. It is not a simple economic problem, but still concerned with political and ethical problem. Constructing the ethics of harmonious consumption and 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ed the education as the guide,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nsumption; need the system to restrain and to 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n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support, to guide reasonable life consumption and to standardiz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Key words :consumption; harmony; eth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刘仲秋

(上接第 101 页)

- [6] 司马迁.《史记》[M]. 韩兆琦,评注. 长沙:岳麓书社, 2004:256.
- [7] [清]赵翼. 廿二史劄记校证[M]. 王树民,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4:14.
- [8] 程金造. 史记管窥[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3.

Study of Criticism to the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in Shih chi

LUAN Jia¹, DONG Yun-ting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Ssu-ma Chien is the great historian and litterateur in China, noted for his authorship of the magnum opus Shih-chi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y records of China. Being practical and critical and having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su-ma Chien, on the principle of being critical of emperors and officials, has finished the historic book Shih-chi which had a dramatic fate. The sensitive insight into the potential crisis in Han dynasty has helped Ssu-ma Chien bitterly denounce the incontinent and cruel lives of the imperators, the intrigues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court and the decline of morality. His criticism even directed to the Emperor Han-wu Di. It is Shih-chi that has toppled down the kingcraft, and it is only Ssu-ma Chien who has had the very courage to criticize the emperor.

Key words :Ssu-ma Chien; Shih-chi; criticism to the emperor

责任编辑:李春英